

会计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沈洪涛 廖菁华

(暨南大学会计学系 510630)

【摘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离不开会计与会计信息，同时也对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政府层面，排放权交易、环境税和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都需要借助会计确认和计量方法作为计价基础。在企业层面，环境会计正在转向生态会计，以计量和管理企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社会层面，政府与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建立起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的对话合作机制。

【关键词】环境会计 生态会计 生态文明

一、引言

环境方面的挑战已成为我国敏感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如土地和水污染带来的健康隐患、PX 项目和垃圾处理引发的群体事件、雾霾造成的外资撤退等等。生态崩溃之前首先引发的是社会不安，如货币贬值、债务失控、破产、社会动荡甚至战争，这些问题都隐含了资源问题（乔根·兰德斯，2012）。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生态文明绝不是物质丰盈和社会富裕后的奢侈品，而是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必需品。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强调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包括了政府、企业和社会等主体，通过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协调作用，使得管制手段、经济手段和社会手段相互补充和促进，从而实现生态文明。政府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者和主要实施者，对环境问题的治理和防治负有不可推卸的关键责任。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既是大部分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绝大多数污染物的直接生产者，企业行为对于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社会包括了社团组织、媒体、家庭和个人等。一方面，作为消费者，他们的消费行为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模式；另一方面，作为环境问题的承受者，其环境监督和环保行动会直接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

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社会，进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都离不开最基本的管理和决策工具——会计及会计信息，同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也将各个层面上对会计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

二、政府层面：发挥会计作用，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

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人类行为的外部性问题。在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看来，外部性存在的原因是产权界定不清。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产权是不清晰的。沿着科斯的逻辑，解决生态问题的一条可行之路就是建立包括排放权在内的生态环境质量交易市场。在福利经济学家庇古看来，产生外部性的原因是私人与社会的边际净产值相背离。要消除外部性，需要对产生负外部性的主体征税，对产生正外部性的主体给予补贴，使私人与社会的边际收益（成本）相等。基于这一理论，世界各国进行环境税和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与实践（洪名勇，2013）。

（一）排放权交易

排放权交易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环境税的实质是向政府购买污染物排放权，税额是购买

^{*}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072125、712722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暨南跨越计划 12JNKY003）和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2JDXM_0011）的资助。

价格。排放权交易与环境税不同的是,政策制定者没有为排放权直接贴上价格标签,而是通过法定的或行政管理的程序将总排放额度分配给各个排放者,实际排放量高于排放额度的主体可以向实际排放量低于排放额度的主体购买排放额度。政策制定者也可采用拍卖的方式分配排放额度(Driesen, 2010)。如果排放权交易价格可以波动,以及拍卖排放权的收益不影响市场正常运行,那么排放权交易与环境税的效果相差不大;如若不然,则排放权交易解决负外部性的效果远低于环境税(Aldy et al., 2008)。当排放权的交易价格高于减少排放量的技术成本时,会激励减排技术的创新,从而降低社会总排放量。因此,排放权交易的价格机制是能否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关键(Driesen, 2014)。排放权交易价格的确定离不开对排放权、生态资产、减排技术的会计确认与计量。目前会计学界对排放权的确认与计量研究较多,但标准仍未统一。欧盟至今仍无统一的碳排放权会计处理指南。美国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已确立了二氧化硫排放的许可证发放和跨区域交易制度,但是FASB至今也没有给出统一的排放权会计处理指南。为完善排放权交易价格机制,迫切需要统一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

(二) 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不仅可以解决负外部性问题,还可以弥补生态环境保护中容易被忽略的正外部性。生态补偿主要对三类主体进行补贴:生态保护的贡献者、生态破坏的受损者和减少生态破坏者。在推行生态补偿制度时,首先需要确定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生态补偿标准取决于对生态资产和生态服务的定价,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使得定价成为一个难题。会计领域新兴的生态系统会计(Ecosystem Accounting)为生态系统定价提供了可能。生态系统会计是一种整合复杂的生态数据、追踪生态系统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与经济活动或人类其他活动联系起来的工具(European Commission et al., 2013)。生态系统会计将与人类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环境信息组织起来,以认识生态资产和生态服务如何为经济生产和消费作贡献,例如生态降解、恢复等能力对经济单位的影响。与传统会计不同的是,生态系统会计更多地运用非货币的实物单位来计量生态资产和生态服务。生态资产和生态服务计量的实质是评估生态系统产生的社会福利(Boyd and Banzhaf, 2007; Bateman et al., 2011; Edens and Hein, 2013)。目前的计量方法有重置成本法、治疗成本法、模拟交易定价法以及其他非市场的计价方法(TEEB, 2010)^①。只有从定量的角度认识生态资产和生态服务的贡献,才能更好地补偿人类活动对它们的破坏。由此可见,生态系统会计提供了生态补偿标准的计量技术,是发展生态补偿制度的基础。

(三) 环境税

对排污企业征收环境税是保护环境的重要经济手段之一。理论上而言,若能用货币计量环境的污染程度,那么最优的环境税征收额应该等于污染程度。但在实际操作中,测量污染程度的技术存在局限性,同时货币计量方法也存在缺陷(Pindyck, 2013),因此难以可靠地确定最优环境税征收额。但无论是否能计算出最优环境税额,环境税都可以有效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会计上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生产原则(Production Accounting Principle),即环境税可以由直接导致环境污染的生产企业缴纳(Polluter Pays Principle; PPP);另一个是消费原则(Consumption Accounting Principle),即环境税可以由间接导致环境污染的消费者缴纳(User Pays Principle, UPP)。这两项原则有助于指导环境税收政策的设计、完善与实施(Serrano, 2007)。自上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荷兰、瑞典、法国等,已开始对污染企业征收二氧化硫税、废水和水污染税等环境税,同时也对消费者征收固体废物税,如一次性餐具税、饮料容器税、旧轮胎税等。我国在2007年首次提出开征环境税,在环境税法立法与实施试点过程中,征收主体以企业为主,忽略了消费者的直接或间接环境污染行为,如排放生活污水、使用塑料容器等。可见,

^① 重置成本法考虑为避免生态资产和生态服务消失的成本;治疗成本是指修复生态资产和生态服务消失的损害所需要的成本;模拟交易定价法是在虚拟的生态资产和生态服务市场中产生的收益作为计价标准(Campos and Caparrós, 2011)

我国的环境税立法与实施还需借助会计原则完善征收主体范围。

三、企业层面：构建生态会计系统，管理企业的环境影响

企业环境会计作为传统会计的一个部分，包括环境财务会计和环境管理会计，是以货币形式计量环境给企业带来的财务影响。尽管环境会计近十年来在实践和学术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进展，但不断出现的环境问题提出了更多的要求。Schaltegger and Burritt (2000) 提出，应将传统会计进一步扩展为生态会计，以计量企业对环境造成的生态影响。传统会计的重点是财务影响，而生态会计的重点是环境影响。生态会计的信息来源包括了财务信息和环境信息，同时使用实物单位和货币单位进行计量，服务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对应传统会计系统中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生态会计系统也可划分为对外生态会计与内部生态会计。

(一) 对外生态会计

传统会计系统中的环境财务会计关心的是环境问题产生的财务影响，包括：环境支出的资本化或费用化、环境负债的核算和披露、环境资产的确认和计量、排放交易许可证的核算等等。传统财务会计通常要在环境事项影响到产品价格和成本时才会做出回应。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中得以反映的环境事项，或者是因金额较大而符合了重要性原则需要单独确认，如：重大石油泄漏事件或者环境灾难；或者是因准则或相关规定要求单独进行列报，通常被归入环境负债或环境或有事项，如：因环境导致的资产减值，因废弃物处置、报废和环境恢复而产生的准备等。

尽管环境事项的性质、对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对公司声誉的影响等会带来显著的财务后果，供应链和弃置链 (disposal chain) 的环境风险也会对经营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但这些都没有在传统财务会计中得到反映 (ICAEW, 2009)。因此，Gray et al. (2014) 指出：需要修正现有的会计系统，以单独确认和计量与环境有关的收入和支出；需要采用面向未来的视角，以反映环境方面潜在的威胁和机遇；需要鼓励使用实物单位，与货币单位同时进行会计计量，以便于设置能源耗费和废弃物方面的目标，并对数量差异进行后续评估。这些正是对外生态会计努力的方向。对外生态会计运用会计的原则和结构对环境增量进行分类、编录、分析，并披露外部利益相关者关心的环境数据。对外生态会计目前可以借助现有的财务会计的基本假设和惯例搭建一个有用的框架，但仍需要建立一定程度的标准化，以降低生态会计信息的成本和提高生态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制定国际公认的生态会计准则，实现生态会计的标准化，还有待会计准则组织更多的努力 (Schaltegger and Burritt, 2000)。

(二) 内部生态会计

传统会计系统中的环境管理会计运用管理会计已有的生命周期成本法、完全成本法、效益评价和战略规划方法，为企业进行环境管理提供财务与非财务信息 (Yakhou and Dorweiler, 2004)。环境管理会计最为核心的任务是确认环境活动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 (如废弃物处置、资源使用、罚款等)、税赋影响以及防范性成本，并将环境成本合理分摊到产品和服务中去。Kreuze and Newell (1994) 提出了改良的作业成本法，将能源耗费、废弃物处置、合规成本等作为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完全成本分析。Deegan (2008) 运用生命周期成本法识别出难以用财务量化的成本项目，包括或有成本、与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相关的无形成本等。美国环境保护署综合作业成本法和生命周期成本法制定出四层级的环境成本方法框架 (Tellus Insitute, 1992)。德国学者在上世纪 90 年代推出物质流成本会计，日本企业在运用中加以完善并取得了明显的效益。

内部生态会计同样是服务于内部利益相关者，也是外部生态会计的基础。内部生态会计与环境管理会计的重要区别在于使用实物单位来计量环境影响，包括：以实物单位记录、跟踪、追溯和分配环境影响，以及评价环境影响的严重性和增量程度 (Schaltegger and Burritt, 2000)。内部生态会计借助实物计量，使得环境绩效评价成为可能。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ISAR) 在 2000 年推出

了将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指标相结合的生态效率指标,即生态效率 = 环境业绩指标/财务业绩指标,以计量单位价值的环境影响,其中的环境业绩指标主要以能源、物质资料的耗费和废弃物为基础。ISAR 还设计了包含多个通用性指标在内的环境业绩指标矩阵供不同行业的企业选用(刘刚和高轶文,2003)。生态效率指标不仅可以评价微观的企业环境绩效,同样可以评估宏观的社会环境影响,将内部环境管理与外部环境报告联结在了一起。

(三) 环境审计

当一个组织要将环境事项纳入到组织活动中时,不可或缺的步骤就是环境审计。环境审计是对任何一个组织的活动与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系统核查(英国行业联盟 CBI, 1990)。根据环境审计的主体可将其分为国家环境审计、社会环境审计和内部环境审计(耿建新和房巧玲,2004)。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 1995 年发布的《开罗宣言》将环境审计列为各国最高审计机关的共同任务,主要内容包括财务审计、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我国审计署在“十二五”规划中指出,要努力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源环境审计理论与方法,完善资源环境审计制度与规范。尽管会计职业界将环境审计市场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但环境审计业务仍然主要由工程与生化背景的非会计人士完成。注册会计师不愿意从事环境审计业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环境审计的公认准则(Beelde, 2005)。此外,审计师自身的业务素质以及公司缺乏对环境报告的需求也阻碍了财务审计师在环境审计中发挥更大作用(Dixon, 2004)。国际内审师协会在《内部审计师在环境问题中的作用》中提出“环境审计是环境管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多数学者也倾向于将内部环境审计看成是一种有效的环境管理工具(Lightbody, 2000; Stanwick and Stanwick, 2001; Moor and Beelde, 2005)。环境审计不仅仅限于验证合法性,还是一种具有完整的战略性特征的组织行为(英国行业联盟 CBI, 1990),包括了环境影响评估、环境调查与核查、环境管理和审计规划、环境信息认证等多种类型,每一种类型都有不同的目标定位、自身特点和知识技巧。

四、社会层面: 公开环境信息, 建立对话合作机制

先发国家的生态政策经历了从控制型手段到市场化工具再到信息公开和对话合作机制的演进过程。社会公众与政府和企业生态文明建设良性互动的纽带和桥梁就是环境信息公开。环境信息手段被称为强制手段和经济手段后全球环境政策改革的第三次浪潮(葛俊杰, 2011)。

(一)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上世纪 60 年代, 美国最早立法公开政府环境信息。上世纪末, 加拿大、德国、韩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相继从法律上明确政府必须公开环境信息。2008 年 5 月 1 日, 我国国务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保护部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于同日起实施, 规定了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公开政府环境信息的行为和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的要求, 标志着我国环境信息依法公开进入新阶段。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本质是政府透明和政府问责。政府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授权下承担管理和使用公共资源的受托责任, 即公共受托责任, 政府应当向公众报告履责情况和结果, 政府会计正是因民主社会中的政府公共受托责任而起。按照公共资源的范围, 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包括对公共预算收支及其后果的受托责任和对政府财务收支及其结果的受托责任, 也包括对更全面的公共资源的受托责任(路军伟和李建发, 2006)。英国直接将改革后的政府会计称为“资源会计”。我国目前还没有能够全面反映政府经济资源、现时义务和业务活动全貌的政府会计体系(刘玉廷, 2004)。如何确认、计量和报告土地、矿藏、森林、河流等宝贵的自然资源, 将是我国政府会计改革面对的最大技术挑战(黄世忠等, 2004)。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求政府报告自然资源的价值及其变动, 以便让社会公众评价政府部门是否有效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

自 2009 年以来,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按照《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要求, 连续四年对 113 个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进行了评价后认为: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水平虽然逐

年提升,但年度增幅却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公开的势头逐年放缓;多数城市日常监管、企业排放和环评文件等关键信息的公开无实质进展,显示环境信息公开遭遇瓶颈。

(二)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

环境信息在大部分国家仍属于企业自愿披露的信息。企业披露环境信息是一种重要的信号传递行为,企业积极披露其环境表现信息以区别于环境表现不好的企业 (Al-Tuwaijri et al., 2004; Clarkson et al., 2008; 沈洪涛等, 2014)。投资者会根据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来估计未来的环境负债 (Cormier and Magnan, 1997; Thompson and Cowton, 2004)。企业的环境信息还成为投资者评价风险和决定资本成本的重要依据 (Plumlee et al., 2009; Dhaliwa et al., 2009; Clarkson et al., 2010)。同时,企业会通过环境信息披露进行合法性管理,影响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表现的认识,树立良好形象 (Deegan et al., 2000; Hughes et al., 2001; Patten, 2002; Frost, 2007; 王建明, 2008; 肖华和张国清, 2008; Aerts and Cormier, 2009; 沈洪涛和冯杰, 2012)。

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经历了补充报告、独立环境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三个阶段,最新的发展趋势是综合报告。最初阶段,企业大多采用补充报告的方式,将环境信息作为对外报告的一个部分进行披露,包括表内披露和表外披露。第二阶段是 1992 年里约峰会后,全球高度关注环境问题,加拿大的 Noranda Minerals 和 Noranda Forestry 公司以及英国的 Norsk Hydro 和 British Airways 公司率先发布独立的环境报告 (Gray et al., 2014),并很快成为全球趋势。第三阶段是进入 21 世纪后,在可持续发展报告 G3 指南^②、AA1000 鉴证标准^③以及国际会计职业团体的积极推动下,占主导地位的环境报告让位于社会责任报告,也称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信息作为社会责任报告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披露。2010 年 8 月,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成立,并于 2013 年 12 月发布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综合报告将企业战略、治理、业绩、前景和财务、环境、社会等重要信息整合在一起,反映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从而实现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最大化。综合报告的突出亮点就是提出了自然资本^④,也称为环境资本或生态资本的概念。综合报告不仅将重塑企业的对外报告,自然资本概念的引入还将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决策方式。

五、结语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彰显了会计的受托责任目标。会计阵营中围绕会计目标形成了立场分明的两派观点: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决策有用观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将公司看作是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工具,关注以股东为代表的出资人,服务于股东在资本市场的经济决策。决策有用观没有认识到会计报告不仅仅是传送一组数字,而且还是传递建立受托责任关系的信息 (Lehman, 1995)。受托责任观关注的是获取信息的权利和提供信息的义务,获取信息的权利是所有多元论或参与式民主的基本要素。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杨时展教授 (1997) 曾经作过“受托责任的存在是人们之所以要会计的根本原因”的精辟论断。Gray (1992) 分析了受托责任观背后的两个目的:一是建立更紧密的社会关系并将获取信息的权利交回给大众;二是可以增加组织的透明度,使得更多组织内部的事物以更多的方式变得可见。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凸显了会计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能力。会计远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如果要改变社会,就不要从会计入手” (Gray et al., 1987) 那样无能。Tinker et al. (1991) 通过对会计的历史分析揭示,会计不是依靠技术细节,而是通过在各个历史时期作为社会沟通的语言来发挥作用。环境会计更重要的作用不是在已有的财务报告中增加环境信息,而是提高社会对话的质量 (Puxty, 1991)。环境不是神秘的会计等式中的成本,相反,它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会计及其审

② 第三代《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由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简称 GRI) 于 2006 年发布。

③ 由非盈利机构 AccountAbility 于 2008 年发布。

④ 自然资本是指所有向组织提供其在过去、现在或未来的繁荣所必需的商品或服务的,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环境资源和过程,包括空气、水、土地、矿产和森林,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参见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征求意见稿)

计可以发展成为公共领域的一个部分,通过披露和解释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反映出什么是我们社会的“重要”方面以及我们存在于世界的方式(Lehman, 1999)。会计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更为开放、透明和民主的社会。

主要参考文献

- 葛俊杰. 2011. 利益均衡视角下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研究: 以社区环境圆桌会议为例. 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洪名勇. 2013. 生态经济的制度逻辑.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ISAR). 2003. 企业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指标的结合 (联合国国际会计与报告标准). 刘刚、高轶文译, 陈毓圭等校.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罗伯·格瑞, 简·贝宾顿. 2004. 环境会计与管理. 王立彦, 耿建新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乔根·兰德斯. 2012. 2052: 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秦雪征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沈洪涛. 2010. 公司社会责任和环境会计的目标和理论基础: 国外研究综述. 会计研究, 3: 86~93
- 杨时展. 1997. 管理会计对会计学术的贡献. 财会通讯, 5: 3~6
- 周守华, 陶春华. 2012. 环境会计: 理论综述与启示. 会计研究, 2: 3~11
- Aldy, J. E., E. Ley, and I. Parry. 2008. A Tax - Based Approach to Slow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National Tax Journal, 61 (3): 493~517
- Coase, R. H.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69
- Deegan, C. 2008. Environmental Costing in Capital Investment Decisions: Electricity Distributors and the Choice of Power Poles. Australian Accounting Review, 18 (44): 2~14
- European Commission,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World Bank. 2013.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 Economic Accounting 2012 Experimental Ecosystem Accounting
- Gray, R. 1992. Accounting and Environmentalism: An Exploration of the Challenge of Gently Accounting for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7 (5): 399~425
- Gray, R., C. A. Adams, and D. Owen. 2014. Accountabil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for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 Gray, R., D. Owen, and K. Maunders. 1987. Corporate Social Reporting: Accounting and Accountability. London: Prentice - Hall
- ICEW/Environment Agency. 2009. Sustainable Business: Turning Questions into Answers - Environment Issues and Annual Financial Reporting. London: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England and Wales
- Kreuze, J. G., and G. E. Newell. 1994. ABC and Life - Cycle Costing for Environmental Expenditures. Management Accounting, 75 (8): 38~42
- Lehman, G. 1995. A Legitimate Concern for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6 (5): 393~412
- Lehman, G. 1999. Disclosing New Worlds: A Role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4 (3): 217~241
- Lohmann, L. 2009. Towards a Different Debate in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The Cases of Carbon and Cost - Benefit.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34 (3-4): 499~534
- Philippe, M., and I. D. Beelde. 2005. Environmental Auditing and the Role of the Accountancy Profession: A Literature Review.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36 (2): 205~219
- Puxty, A. G. 1991. Social Accounting and Universal Pragmatics. Advances in Public Sector Accounting, 4: 35~47
- Schaltegger, S., and R. Burritt. 2000.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ssues: Concepts and Practice. Sheffield: Greenleaf
- Tinker, T., L. Cheryl, and M. Neimark. 1991. Falling Down the Hole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Political Quietism in Corporate Social Report. Accounting, 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 4 (2): 28~54

Abstracts of Main Papers

The Better the Accounting Developed , the More Civilized the Political System Constructe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Developing of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Liu Minghui & Liu Yafang

Political system is a necessary system environment for the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system to rely on. Meanwhile ,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On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 Chinese government proposed to construct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which also brought new requirements and task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This paper aims to explai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through the six following aspects: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 political openness , political legalization , political efficiency , political incorruptibility , and political stabilization.

Accounting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Eco – civilization

Shen Hongtao & Liao Jinghua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eco – civiliza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accounting and accounting information , while it requires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From government perspective , emission trading , environment tax , and eco – compensation system are all relying on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in accounting to provide valuation basis. From firm perspective ,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s turning to eco – accounting to measure and manage the impacts of business on eco – environment. From social perspective ,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opening will help to establish the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eco – civilization.

The Value Relevance of Analysts Recommendation , Investor Sentiment and Fair Value Recognition: Evidence from Financial Assets Available for Sale of Listed Firms in China

Huang Linhua & Qu Xiaohui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value relevance of the fair value recognition for financial assets available for sale (FAS , in shor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convergence with the IFRS. Using modified Feltham & Ohlson Model with 174 samples from A share firms in China , we find that the FAS is informative to stock price , and analysts recommendation is positively relevant to the value relevance of the fair value recognition for FAS , but investor sentiment is irrelevant to the value relevance.

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Voluntary Adoption of IFRS by Unlisted Firms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UK and Germany

Yang Dan

This study provides direct evidence on unlisted firms'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 , differing from most of previous studies that mainly focus on listed firms. Through selecting a sample of unlisted firms in the UK and Germany , I find that firm size , leverage , legal form , profitability and country – leve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ontribute to unlisted firms' IFRS choices. I further find that the country – leve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ails to strengthen or weaken the role of firm – level factors affecting IFRS adoption. The evidence this study documents offers insights regar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unlisted firms' adoption preferences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 and suggests which types of unlisted firms prefer to use and benefit from IFRS.

Business Complexity , Industry Expertise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Zhang Bin & Wang Yuetang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possibility for industry experts to efficiently release special information under complicated business environment , and provides the following empirical evidence: Industry – specialized independent directors impair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business complexity and stock – price synchronism. Further verification indicates that when industry experts have political background , their adjusting effect on business complexity and stock – price synchronism is significantly impaired. The conclusion will serve as evidenc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of board of directors of Chinese companies and supervision effect.

Listing Approach , Political Favours and Earnings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Family Firms

Huang Qiongyu et al.

The listing approach taken by Chinese family firms relates to the political favours that a family firm can obtain from local government , which coul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rporate financial reporting behaviour. Using a sample of Chinese family firms over the period from 2003 to 2008 , we find that family firms going public through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s) obtain more bank loans , more subsidies and lower tax rates than firms going public through a takeover.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listing approach and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reporting shows that the earnings quality is systematically worse for family firms going public through IPOs than those going public through a takeover. Subsample regressions reveal that , in IPO firms , the magnitude of political favours obtained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reporting.